



世纪前沿

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

[英]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 著

Alex Callinicos

罗汉 孙宁 黄悦 译

反资本主义宣言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反资本主义宣言

[英]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 著 罗汉 孙宁 黄悦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资本主义宣言 / (英)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 A.)著；

罗汉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An Anti-Capitalist Manifesto

ISBN 7—5327—3599—0

I . 反... II . ①卡... ②罗... ③孙... ④黄... III . 全球化

—研究 IV .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890 号

图字：09—2003—499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责任编辑 胡峙峰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反资本主义宣言

[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 著

罗汉 孙宁 黄悦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yiwen.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9.25

插 页 4

字 数 115 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7—3599—0/F · 162

定 价 19.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势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前　　言

这本书是我在参加各种首脑会晤以及政治事务的过程中构思并撰写的。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结束后，我在阿雷格里港(Potro Alegre)机场的候机厅内拟定了本书的提纲。接下来我参加了为将在佛罗伦萨举办的首次欧洲社会论坛(European Social Forum)的准备活动，并在期间完成了本书的创作。回顾本书的内容，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套三部曲丛书的一个结尾。前两部分别是写于1999年的《平等》与2001年的《反第三条道路》。尽管最初的创作构想并非如此，但这三本书的关系的确有点类似黑格尔的三部曲。《平等》探讨了抽象意义的公平法则，《反第三条道路》提出了反面的批评意见，而《反资本主义宣言》则分析了当前致力于实现公平法则并由此改变世界的具体行动。或许也可以把本书当作一本讨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国际运动以及运动中的战略和手段的书来单独阅读。

《反资本主义宣言》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在欧洲激进左派内部的对话发展中，丹尼尔·本塞德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在与他交流的过程中也受益匪浅。迈克·冈萨雷斯陪我两次访问阿雷格里港，我在与他的交谈中也得到很多启示。克里斯·班博利，克里斯·哈曼，克里斯·南汉姆还有一位匿名审稿人阅读了全篇手稿：我在此衷心感谢他们对我提出的建议和鼓励。与出版社的合作如往常一样愉快：我感谢海伦·格雷，大卫·海尔德，瑞切尔·科尔和潘·托马斯的帮助。但我最要感谢的

反资本主义宣言

是塞姆·阿诗曼：她分担了书后的许多工作，阅读初稿，提出批评，并经常帮我出主意、找资料。出于谢忱，我谨将《反资本主义宣言》题献给她。

引　　言

一起不期而遇的事件

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自由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政权瓦解后的 10 年间又恢复了生机。弗朗西斯·福山当时提出了著名论断，称这种资本主义复兴代表着“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的失败表明，除了自由资本主义，任何其他所谓的进步制度都是不可行的。^[1] 尽管几乎没有人认同新黑格尔主义以及引发福山论断的里根必胜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很多人却在实际上接受了它的理论实质。毕竟，后现代主义还有其后的衍生主义（例如后殖民主义），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自由主义的学术圈内早已根深蒂固，并且早就预示着“宏大叙事的破灭”，而一个分割的、多元化的世界即将形成。在这个新世界中，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质疑，将会导致集权主义的复生，这种集权曾造成了奥斯威辛和古拉格群岛的惨案。^[2]

更重要的是，同样的思想倾向也已经反映到公共政策中。1990 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杜撰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一词来指世界范围内的执政者们在至少 10 个政策领域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安排，包括：财政制度，公共支出优先权，税务改革，金融自由化，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私有化，放松管制，知识产权等。^[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期繁荣中，上述政策的大多数会被当作是那些梦想回到 19 世纪的异端经济学家的妄语而被嗤之以鼻，因为主流经济思想体现的是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取决于政府的介入并以此

保证充分就业的论断。苏珊·乔治(Susan George)的描述只是稍稍有点夸张：“在1945年或者1950年，如果你提出任何属于现行新自由主义框架的见解或政策，你就会立刻被轰下台，或被送往疯人院。”^[4]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战后首次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这些所谓的邪说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新自由主义，作为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主流不断较量的结果，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正统经济学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克服了来自当权派和强大的工会团体（比如成立于1981年的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组织和1984—1985年的英国矿工组织）的重重阻力，成功地推行了自由市场政策。到80年代末期，当时的国际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推行类似的改革。一方面，始于8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经济大滑坡带来大规模的国际债务危机，使得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要挟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结构性调整；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也使得美国趁机怂恿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的执政者推行“休克疗法”，从而生硬地将他们原有的国有独立型经济纳入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体系。^[5]

从全球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正统地位的确立至少部分反映了美国政府为保住其冷战后的霸主地位所作的成功政策性努力。这一系列政策的总称——“华盛顿共识”，象征着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间错综复杂的关系。^[6]而且很大一部分国际左派也接受

[1] F.Fukuyama (福山)，*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1992)。关于福山的论文及其引发的争论的关键性讨论，参见 A.Callinicos, *Theories and Narratives* (Cambridge, 1995), ch.1。

[2] 对这一论点最近的批判，参见 Žižek,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London, 2001)。

[3] 参见 R. Broad and J.Cavanaugh, “The Death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n W. Bello et al., eds, *Global Finance* (London, 2000), p.84。

[4] S.George, ‘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ibid.*, p.27。

[5] 这主要是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立场上的说法，in W.Bello et al., *Dark Victo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Poverty* (2nd edn, London, 1999)。

[6] 尤其参见 P.Gowan, *The Global Gamble* (London, 1999)。

了这些思想，使这一胜利变得更为重要。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将比尔·克林顿的新民主路线与里根的共和主义和以前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林顿·约翰逊为代表的中央经济统制论者处理经济、社会问题的做法区分开来。事实上，克林顿政府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很快就通过其联合大企业与共和党右翼，成功说服国会在1993年通过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不懈努力中体现出来。^[1]

有了托尼·布莱尔同他的幕僚安东尼·吉登斯近乎狂热的宗教式宣讲，第三条道路几乎成为一种必要的经济安排。全球化已经使得财富再分配、公共所有权等陈旧的左翼残余观点黯然失色。而被改头换面的“中左派”（centre-left）则不得不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某些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集权的社会政策。^[2]这样一来，可以说是把政治剔除到了政治之外：既然所有权威人士都接受了自由资本主义，那么所谓政治上的争论就只能局限在一些次要的技术性问题或者人性阐述问题上。毫无疑问，托尼·布莱尔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大放异彩：他对英国政治的统治性影响在2001年6月那场沉闷乏味的大选中得到充分体现。2002年4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中，马利·勒庞在第一轮出人意料的胜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的两股主流候选力量立场太相似。当时的原法国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居然被挤到第三的位置上。看起来意识形态的终结，似乎真的像丹尼·贝尔在上世纪60年代初预言的那样，已经来临。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庸置疑地取代其他意识形态，成为真正的主宰。一位资深的西方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曾这样写道：“自宗教改革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把宗教教条斥为腐朽的古训，在整个西方，甚至是全世界的思想界，已经听不到任何显著的系统化的反对呼声了。”^[3]

[1] J.R. MacArthur, *The Selling of “Free Trad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2000)。

[2] A. Callinicos, *Against the Third Way* (Cambridge, 2001)。

[3] P.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II) 1 (2000), p.17。参见 Gilbert Achcar’s measured critique, “The ‘Historical Pessimism’ of Perry Anders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 88 (2000)。

但这句话在 2000 年初刚一出现立刻就显得过时了，因为 1999 年 11 月末在西雅图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当时世界贸易委员会正在那里举行新一轮的贸易会谈。会谈的首要议题就是进一步实现贸易与服务的自由化：那些已经在私营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投资银行，跨国公司们正贪婪地注视着仍未完全开放的公共服务领域。在这次会议上，众多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的立场空前的一致，齐唱赞歌，堪称达成“华盛顿共识”以来的又一胜利。然而西雅图也出现了许多不速之客——40000 名示威者，他们是美国各大工会组织的核心力量，非政府组织及致力于环境保护、公平贸易和削减第三世界债务组织的成员。示威者的人数之多，态度之强硬，组织方法之先进，着实令当局吃了一惊。示威有效地干扰了西方政府（特别是因为一系列争端而划分开的美国阵营与欧盟阵营）在统一行动上的谈判，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欺侮。于是谈判最终破裂。不可一世的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势头也暂时得到了遏制。

西雅图事件的影响非同小可。尽管示威者最后被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和一些老左派人士当作扰乱社会治安的乌合之众驱散^[1]，但这次示威的成功却给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挑战新自由主义的信心。全球化的表现之一是当前各种简称的泛滥，G8, IMF, EU, APEC, FTA……诸多的示威行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矛头直接指向各种国际会议，比如华盛顿会议（2000 年 4 月 16 日），米约会议（2000 年 6 月 30 日），墨尔本会议（2000 年 9 月 11 日），布拉格会议（2000 年 9 月 26 日），汉城会议（2000 年 10 月 10 日），尼斯会议（2000 年 12 月 6—7 日），华盛顿会议（2001 年 1 月 20 日），魁北克会议（2001 年 4 月 1—20 日），歌德堡会议（2001 年 6 月 14—16 日）……在这一系列示威行动中，示威者与警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在 2001 年 7 月 1 日至 20 日热那亚

[1] 比较 M. Wolf, “In Defence of Global Capitalism”, *Financial Times*, 8 December 1999 和 F. Rouleau, “L’Ennemi, est-ce la ‘mondialisation’ ou le capitalisme?”, *Lutte Ouvrière*, 3 December 1999.

八国峰会过程中达到顶点。这次冲突中警察使用策略离间了示威者群体中的少数派（黑人无政府主义者）来瓦解暴力冲突，结果导致了当地青年卡洛·古里安尼遭枪击事件的发生。

在热那亚会议的余波中，《金融时报》刊发了一系列主题为“受围攻的资本主义”的文章，专门探讨所谓“反资本主义”的产生。“反资本主义者”主要涉及：

数百万参与者的全球政治运动中活跃着的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

就在柏林墙被推倒和福山做出“历史的终结”论断后的10年间，人们能明显感觉到全球资本主义正卷土重来……新的激进主义浪潮对资本主义态度暧昧，只是简单地认为其超越了应有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因为有多处抵触人类文明的地方，造成人们主观上的厌恶与警觉。正是它通过股票市场，驱使无数的公司企业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惜破坏性地掠夺环境资源，毁灭物种，并且拒绝履行救济贫困阶层的承诺。人们担心社会民主已经无力阻止它的扩张，因为那些政治家们可能已经被企业收买，国际政治机构也已经成为企业扩张战略中的棋子。^[1]

社会批评的复兴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霸权始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那么截至1999年11月30日的西雅图首次示威行动，也不过存在了10年的

[1] J. Harding, “Globalization’s Children Strike Back”, *Financial Times*, 11 September 2001。更多类似的调查参见：A. Starr, *Naming the Enemy: Anti-Corporate Movements Confront Globalization* (London, 2000), and E. Bircham and G. Charlton, eds, *Anti-Capitalism: A Guide to the Movement* (London, 2001)。Daniel Bensaïd 做了很好的综述 (2002): “Le Nouvel internationalisme”，即将刊发于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时间。“华盛顿共识”仍在为几乎每一个国家提供制定政策的框架，但它现在却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西雅图示威事件虽不是挑战开端的标志，却把这项运动推进到了实质性的阶段。本书并不打算记述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史，但是那些促成上述运动的因素的确值得一提。

-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主要的导火索。虽然针对签署协议的反对运动未取得成功，它却使对全球化问题的辩论成为焦点。随后，像马克·鲁伯特所说的，“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自由论调在美国国内开始受到至少来自两方面的质疑。一方面是大同主义者和主张民主的左派势力；另一方面暂且称其为民族主义色彩的右派。”前者——被鲁伯特称作“跨国政治参与的分享立场”，网罗了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左派势力组成后来日益壮大的反自由贸易组织。他们首先在1998年加速了一项旨在保护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安全的多边投资协定的最终流产，进而在西雅图示威中大显身手。^[1]
- 在1994年1月1日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发生的叛乱对刚刚起步运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有深远影响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领袖马科斯发起了这次运动，并且公开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剥夺了墨西哥宪法赋予农民使用公共用地的合法权利，无异于对墨西哥当地的农民“判处了死刑”。^[2]于是墨西哥国内的混乱局势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建立起的复杂关系成为萨帕塔当局宣传攻势的主题。^[3]马科斯甚至称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全球化“将金融市场冷酷的交易规则强加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简直无异于发动了“第四次世界大战”。萨帕塔民族解

[1] M. Rupert, *Ideologie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2000), pp.15,70。

[2] “Testimonies of the First Day”, in T. Hayden, ed., *The Zapatista Reader* (New York, 2002), P.216。

[3] Subcommandante Marcos, “The Fourth World War has Begun”, ibid., p.273。

放军的领导者们有效地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媒体加强宣传，使之成为正在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事实上，该国南部的恰帕斯运动不过是逐渐形成的反全球新自由主义斗争的一个缩影。尼日利亚政治活动家肯·萨罗维瓦由于领导了保护奥戈尼人免受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壳牌）劫掠的政治运动，而在1995年11月被尼日利亚军政府处死。他的死是国民抗击资本主义全球化暴政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 一种被称为“全球治理”现象的发展也是促成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因素。全球治理不仅指如联合国、八国集团、欧盟这种正式的跨国政府合作机构的扩张，还指那些活跃在公共事务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崛起。约翰·劳埃得曾指出：对非政府组织参加官方会议的鼓励，如参加1992年有关全球变暖的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一旦政府显得缺乏通过这类会议取得实质性成果的诚意，就会产生负面效应。^[1] 非政府组织的扩张会促使那些原本针对某个个别问题的改良运动的组织，例如法国的国际人道主义运动组织、反对在北美国家校园中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劳动力的禁止苦活运动组织，结成新的联盟。
- 第三世界的债务丑闻成为受公众瞩目的又一焦点。各种抗议活动甚至将教会等中性非军事组织，如福音两千年（Jubilee 2000）^[2]，卷入其中。回顾1998年伯明翰和1999年科隆八国峰会期间的大规模反债务示威，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日后西雅图和热那亚更大规模对抗的影子。^[3]
- 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与经济危机是又一关键性事件。尽管它被“华盛顿共识”的维护者们用来宣扬英美资本主义模式

[1] J. Lloyd, *The Protestant Ethic* (London, 2001), pp.38—39。

[2] 一个主张免除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国际组织。——译者

[3] A. Pettifor, “The Economic Bondage of Debt-and the Birth of a New Movement”, *New Left Review*, (I) 230 (1998).

相对于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其他人看来，它却说明了一个不受约束的世界经济环境是多么危险：巨幅的投机资本能够在一夜之间冲垮一个国家。这次危机连同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有新自由主义味道的“援助”措施，在意识形态方面影响深远。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对冲基金大亨乔治·索罗斯，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保罗·克鲁格曼，杰弗里·萨克斯，开始站出来猛烈抨击“华盛顿共识”。斯蒂格里茨在西雅图示威运动前夕突然被世界银行解除其首席经济学家的职务，这更激起了人们对国际金融机构行为合法性的质疑。^[1]

- 最终，大规模反对新自由主义行动在七国集团成员国之一的法国爆发了。1995年11月—12月间的公用事业领域大罢工沉重打击了保守联盟推行的自由市场“改革”，并且在1997年6月将奥内尔·若斯潘领导的“多数左派”推上政坛。若斯潘（在其社会主义论调掩盖下）则加紧推行自由化，规模之大更甚于其右翼前任。于是一股对立于若斯潘政府的新的左派力量又通过《雷·蒙德外交》月刊和ATTAC（法国的一个反全球化运动组织）的反对国际金融投机运动集聚起来。^[2]这股力量在2002年4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发威，若斯潘在首轮竞选中就出人意料地被淘汰出局，极左派的候选人则赢得了超过10%的选票。全球性的新左翼倾向还有很多典型代表：例如以农民领袖若泽·博韦为代表反对转基因生物和其他危害农业健康发展行为的运动；《雷·蒙德外交》月刊和ATTAC在巴西波多·阿雷格里举行的世界社会论

[1] 参见 P. Bond, “Their Reforms and Ours”, in Bello et al., eds, *Global Finance*, and R.Wade, “Showdown at the World Bank”, *New Left Review*, (II) 7 (2001)。自由国际主义者的观点由 R.Gilpin 提出,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2000) and H. Jame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2001)。斯蒂格利茨特别在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2002) 中提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

[2] J. Wolfreys,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 84 (1999).

坛中扮演的角色；以及 ATTAC 在全球的迅速扩张（截至 2002 年初已经在 4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支部）。

整个反对过程绝非仅仅是示威游行和街头抗议。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全球性的运动是因为它已经通过众多学者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论调。这些学者中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位是皮埃尔·布迪厄。从 1995 年的大罢工直到 2002 年 1 月逝世，他作为法国知名的政治学者，始终战斗在抗击新自由主义的前线。在一个叫做雷松·达吉拉尔的组织（由激进学者组成）的帮助下，他出版了一系列简短、便宜的图书，其中《反击》和《反击 2》两册由布迪厄亲自执笔。另外一个是诺姆·乔姆斯基，这一位在上辈眼中孤立、倔强的美国外交政策批评家，如今发现世界上有很多人十分赞成他提出的关于美国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建立经济霸权的论断。与这两位老一辈的泰斗级人物并肩作战的还有很多当今的知名评论家和活动家——例如迈克尔·阿尔伯特，沃尔登·贝洛，苏珊·乔治，托尼·内格里等——以及一些像内奥米·克莱恩，迈克尔·赫特那样一夜成名的年轻学者。他们的立场和主张正在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些人都是某部重要著作的作者，借助互联网的快速传播，更多的读者接触了他们的文章。

这一系列著作的出现还标志着学术群体在更大范围内的转变。在一项本身就促进了学术多样化的大规模的学术调查中，吕克·博尔坦斯基和伊夫·查皮埃罗把法国 90 年代针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称为“社会批判的复兴”。^[1]然而社会批判实际上正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力图排斥的言论。比如，让·博德里亚这样写道：“如今我们的文明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过分异化，而是为了达到主体间的至察所导致的距离的消失。”^[2]异化的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的主题之一，体现了一种本真的

[1] L. Boltanski and E. Chapiello, *Le Nouvel esprit de capitalisme* (Paris, 1999), esp. Part III.

[2] J. Baudrillard, *The Illusion of the End* (Cambridge, 1994), p.81.

主体与排斥其自我实现的现存社会关系之间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存在于环境决定论者对 60 年代“作秀的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提出的批评当中。而在盖·德堡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是作秀的统治：“一切直接存在的事物都转化为一种表达”，处于一种各种作秀逐渐汇集成“具体的生活倒影”的状态。^[1]

但是，博尔坦斯基和查皮埃罗认为，在同一时期本真的概念也受到思想家吉尔·德勒兹，雅克·德里达等人猛烈的学术性攻击。他们的著作对后现代主义都有很深的影响。博尔坦斯基和查皮埃罗认为他们对本真与非本真之间对立的解构促成了 80 年代与 90 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事实上，无数的作秀在汇集，问题被隐瞒，人们相信任何事物都不过是幻影，在这个世界中所谓‘真正’的本真性已经被剔除，对‘本真’的追求只是一种幻觉。”^[2]博德里亚作为解构本真性的领导者，声称一切思想和政治斗争在这个由模仿而非作秀构成的社会中已经过时，现象已经不再是真实的代表而成为真实的组成部分。^[3]

反资本主义运动著作和运动的再现标志着后现代主义在过去的 20 年中独霸先锋思潮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反映这种变化的现象之一就是对文化背景问题的过度关注开始降温，该问题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主宰了激进的学术界，取而代之的是对于物质的关注。这一变化在以往的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中间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理查德·罗蒂，他的著作曾在后现代主义融入美国学术文化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而如今他却开始抨击“文化左派”漠视全球化对美国社会的分化。^[4]罗蒂帮助成立文化左派以及他那显然无效的回归社会民主的药方，这一

[1] G.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1970), §§ 1, 2.

[2] Boltanski and Chapiello, *Le Nouvel esprit de capitalisme*, P.548. 博尔坦斯基 (Boltanski) 和查皮埃罗 (Chapiello) 很偶然地与 Bourdieu (布迪尼) 走到一起，共同进行真理的批判，尽管他们承认这种思想在其心目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参见 ibid., pp. 549—550 and 769, n.39。

[3] 例子参见：J.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New York, 1983)：情景主义者的分析被明确地否定，p. 54。

[4] R.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Cambridge MA, 1998), pp.73—107。